

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

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大学的 早期传播

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

钱聪 王刚 著

Karl Marx

非
外
借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

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大学的 早期传播

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

钱聪 王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 / 钱聪,王刚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651-3973-4

I. ①马… II. ①钱… ②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5953号

-
- 书 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
作 者 钱 聪 王 刚
责任编辑 刘娟娟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9号(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373872(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电子信箱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市文丰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开 本 66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8千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973-4
定 价 42.00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进入近代中国大学的条件	9
一、场域条件:近代中国大学的变革与勃兴	9
二、社会力量的转移:“学生社会”的崛起	22
三、思想的导引:“‘五四’前后”的社会思潮演变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兴起	3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进程	47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初步传播(1912—1923)	47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广泛传播(1923—1927)	61
三、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学教育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1927—1937)	68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80
一、1912—1923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传入与认知	80
二、1923—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96
三、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106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特点	115
一、传播主体由个体向组织转变	115
二、传播内容的选择性	121
三、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133
四、传播的区域和校际存在差异性	148

五、传播环境的可塑性	15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	156
一、整合传播: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组织的建立	156
二、立足现实,建构和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161
三、整合传播媒介,拓宽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167
四、依托受众,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策略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170
五、重视宣传,加强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多元渗透	17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182
一、坚持主导作用与主体作用的统一,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合力	182
二、坚持传播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吸引力	190
三、坚持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统一,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效力	194
四、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渗透的统一,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感染力	196
结 语	201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14

绪 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输入,不断被中国人民认同、接受并以它为指导从事改造中国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中国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一方面,近代中国大学促进了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策源地”。如1922年6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到,当时的党员人数中,“北京20人”,这20名党员中有17名北大成员,另外3人则为北京女高师的缪伯英、天津北洋大学的张太雷和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所的工人领袖史文彬。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大学辐射带动社会民众接触、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辐射带动不仅在于教育领域的中高等院校之间,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方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对当前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迪。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必然要求,大学作为人才高地和思想源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探讨近代中国大学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总结借鉴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经验,对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从1980年至今,题目中直接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学术论文有1000余篇,其中篇名含“早期传播”的学术论文有200余篇。另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普通书库检索发现,书名中直接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论著有100余部。其中,代

代表性的著作有以下几部：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此书探讨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多种路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早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较量，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历程进行了研究；^①王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此书借用“语境”这一语用学常用的概念，从内外语境入手，运用传播学、内外史相统一的方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问题。^②除此之外，代表性的史料集主要有以下几部：林代昭、潘国华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传入到传播》，此书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自清末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③高军等主编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④等等。这些论著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多重路径、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产生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

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来自以下两种研究视角。

第一，传播史的研究视角。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内容、载体、环境等。

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体的研究。这是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物群体研究。陶季邑在《民主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中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朱执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进行了研究。^⑤萧超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则指出，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资

^① 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 高军等：《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 陶季邑：《民主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传教士李提摩太、改良派梁启超等就开始了传播活动。^①另一方面是人物个体研究。学界针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研究对象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杨匏安、陈望道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多从个体的思想演变及其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综观以上研究成果,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人物群体的研究多从阶级属性入手,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传播活动进行研究,而较少从群体的职业属性着手对大学中的教师群体、社团同人展开深入探究。对于人物个体的探究多从思想历程方面开展,较少从个体间的人际交往中探讨其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的研究。部分学者首先注意到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如李军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角色定位》中就针对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予以深入探讨。^②除此之外,学会社团在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学界关于早期社团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外国语学社、觉悟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曲广华在《五四社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地位的确立》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实践与争鸣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社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纪念活动展开了探究,如陈金龙在《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中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由来、类型、形式、基本特点等的考察,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④胡国胜在《试论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则从政治符

① 萧超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② 李军林:《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角色定位》,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

③ 曲广华:《五四社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地位的确立》,载《北方论丛》2007年第6期。

④ 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

号的建构与传播的角度，考察早期纪念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① 在以上的研究成果中，虽然不乏针对高校内部创办的社团、报纸、杂志等的研究，但这些考察多偏重史料的整理。以高校内部的报刊研究为例，学界相关成果多通过系统的梳理，从宏观上把握相关报刊的发展脉络、政治倾向、办刊宗旨、风格等，但高校刊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媒介，是如何通过与读书人的互动影响读书人的思考方式乃至价值取向，进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的，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关注。再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高校师生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这种纪念活动与纪念传统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都是可研究的课题。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路径的研究。一种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途径入手进行探讨，回答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从哪里来”。如田子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中认为，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源于东（主要是日本）、西（西欧，以法国为代表）、北（主要是苏俄）三面。^② 还有一种研究则侧重探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进入”中国语境的。对此的介绍大致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翻译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如李百玲在《从翻译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认为，翻译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和初始环节，翻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语境，反映了翻译主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使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翻译具有中国特性。^③ 另一方面，对于三次论争的新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对于三次论争的认识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学者们力图更为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三次论争。如罗志田在《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中认为，这场论战未必是对立的，更多的是观念的冲突。^④ 张琳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土壤——以无政府主义为视角》中则提出与无政府主义

① 胡国胜：《试论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李百玲：《从翻译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载《上海翻译》2009年第1期。

④ 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者的争论促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思想土壤。^①综观以上研究成果,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从哪里来”以及“如何进入”中国语境,而对微观层面如“进入中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近代中国大学进行传播”这一问题则缺乏相关研究。

第二,教育史的研究视角。

一是近代教育制度史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以通史或教育制度简史的形式梳理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如曲士培在《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一书中从历史背景、文教政策、大学教育制度、大学教育管理等方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从古至今中国几千年的大学教育发展演变脉络,并对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实践做了重点评介,为全面把握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概况提供了参考借鉴,然而作者针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历程中的传播情况则论述较少,仅略微提及。^②另一方面,以大学校史的形式论述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传播。如萧超然、沙健孙等主编的《北京大学校史》,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写的《四川大学史稿》,梁山、李坚等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等等,这些论著在系统梳理本校的发展历程的同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马克思主义在该校的传播与发展,但大都未对其进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二是近代教育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学界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人物的个体思想上。如梁柱在《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结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的教育思想,考察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③张元隆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与上海大学》中则着重考察了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早期在上海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④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学者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思想建设历程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传

^① 张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土壤——以无政府主义为视角》,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

^②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梁柱:《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 张元隆:《中共早期领导人与上海大学》,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播，如周良书在《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中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自身建设及其对中共历史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进行研究，但并未对近代中国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①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必然性、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本书选取以下两点加以简要介绍。

第一，关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起源及其传播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如英国学者迈克尔·路克在《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起源：形成中的意识形态（1920—1928）》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以及党的建立问题。^② 贝利在《中国人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中则对中国学生旅法的动机和赴法后的思想变化，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从事建党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他认为这些留法学生归国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并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杰留辛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2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史略》中着重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成立，而党尚未诞生的1920年底的情况，他认为参加辩论的李大钊、李达、李季和施存统虽远不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张东荪辩论时那样坚决，但整体上仍为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全面回顾了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

第二，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人物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研究的重点，其中以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通过对李大钊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深入研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加以改造的历史起源及其过程，进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历史主题。涉及瞿秋白的主要有日本学者姬田光义的《瞿秋白研究》、苏联学者施奈德的《瞿秋白——革命家、作家、斗士》等等。值得一提的是，

① 周良书：《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英]迈克尔·路克：《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起源：形成中的意识形态（1920—1928）》，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受我国学术风尚的影响,逐渐对一些较为特殊的人物展开研究,如中共早期人物张申府、李达、沈玄庐、邓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我国在某些领域研究的不足。然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问题放入近代中国大学这一视角下进行深入探究的尚不多见。

本书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近代中国大学”结合起来,选取大革命时期的几所高校进行实证性研究,通过相关史料、数据的考察统计,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早期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为此,本书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大学和高等教育。大学和高等教育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分化又有交叉。高等学校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载体,包括大学、学院以及各类专科学校。由于本书考察时间主要是1912—1937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虽初具规模却并不成熟,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大学教育更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主要以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干部教育、军队短期培训为主。因此,本书中的大学所涵盖的范围也包括各类专门学院以及一些大专院校。

第二,学生。《中国百科大辞典》将“学生”一方面定义为在各级各类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学习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另一方面则泛指一切受教育的人。因此,从范围上说,学生的范围是较为广泛的;而从角色认知方面来说,学生主要指代同时进行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主体。因此,本书中所讨论的学生从范围上以专科院校学生、大学生以及研究生为主,他们多数是已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双向主体。

第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学界对此认识各不相同。就本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主要指1912—1937年。具体来说,首先,将早期传播的时间上限设定为1912年,是因为民国初年颁布“壬子学制”,该学制推翻了清末教育制度上的改良方针,逐步确立起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体制,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新阶段;其次,将早期传播的时间下限设定为1937年,一方面,“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华北沦陷,华东、华南、华

中等地相继告急，全国 108 所大专院校除少数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大部分高校陆续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近代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是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为此，这一时期高校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表现在理论的宣传上，而且结合党内的思想斗争，在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传播主体等方面都与前一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传播模式”分析方法、文献资料法、个案研究法。

第一，“传播模式”分析方法。本书采用“7W”模式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大学的传播问题，即 who(谁传播)、says what(传播什么)、through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with what effect(取得什么效果)、what environment(传播环境)和 what aim(传播意图)，从传播路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载体四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特点，并在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迪。

第二，文献资料法。本书在搜集、整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历史环境展开研究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概况、特点等。

第三，个案研究法。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过程中，选取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个案分析研究，借此得出相关理论成果。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进入近代中国大学的条件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无疑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视角而言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的理论形态走向运动的实践形态，给处于迷茫和困惑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震撼，由此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际上，回望这一时期的思想图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始于十月革命，而是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了零零散散的介绍、传播和研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从1899年英国社会哲学家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开始，一种新的思想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近代中国大学为何成为其最先扎根的土壤？新式教育体制下诞生的“新学生”们缘何承担起思想传播的重任？他们又是如何在众多社会思潮中最终服膺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问题链，本章将从近代中国大学的兴起与变革、“学生社会”的崛起以及“‘五四’前后”社会思潮的演变三方面加以阐释。

一、场域条件：近代中国大学的变革与勃兴

中国的大学教育古已有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早发端于汉武帝时期的“太学”，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培养职业官员。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则是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而孕育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的形成不是从内部自然发生的，而是深受外来因素的刺激和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响。无论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还是在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上，近代中国大学教育与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太学”有着本质区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一）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大学教育的勃兴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相当多的中国人痛感“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①，中华民族已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人普遍认为，要救亡必须首先重视教育。在国内教育界，废科举、办学堂，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清政府为了鼓励全国兴办学堂，在1901年推行的所谓“新政”中颁布了兴学诏书，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②。至1909年，全国中学堂已有460所，中学生有40468人；小学堂有51670所，小学生有1532746人。^③但当时仅有各级学校的名称，还没有正式的学校系统。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的出现，最早是在1902年（农历壬寅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这个章程主要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及《蒙学堂章程》等，史称“壬寅学制”。从纵向来看，这个学制将整个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其中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和大学院（年限不定）三级；从横向来看，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仕学馆、师范馆和高等实业学堂。遗憾的是，这个学制虽然曾经正式公布过，但由于不够完备，因而并未付诸实践。

1903年（农历癸卯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又合拟《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除规定学校系统外，这一学制还订立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及学校设置办法等。从纵向来看，这个学制将整个教育分为三

① 《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②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③ 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97-112页。

个阶段和七级,其中的高等教育阶段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如儿童从七岁入初等小学堂,一直到从通儒院毕业,共计26学年;从横向来看,与高等学堂同级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进仕馆、译学馆等。

然而,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它们基本上都未摆脱清末“中体西用”改良方针的影响。如“壬寅学制”规定了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分别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同时,科举出身的人也可以分别被送入高小、中学、高等学堂和仕学馆。而“癸卯学制”则基本上是参照日本进行的改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在形式上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实质上则存在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在“立学宗旨”中,“癸卯学制”非常推崇圣人学说,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①。在学制所规定的课程中,读经等课程仍占有很大比重,教师大多还是旧式的士大夫,而许多学生则认为入学学习同过去的科举应试类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提出临时政府的任务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②。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③ 这些规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教育领域的革新,同时也为新式教育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趁机窃取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但在袁世凯建立北京政府初期,政权内还保存着一定的革命派的力量,蔡元培依然担任教育总长。

^①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29页。

^②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③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167页。

1912年(农历壬子年)9月,随着袁世凯组阁的完成,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随后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法令。1913年(农历癸丑年),教育部又将这些法令和此前颁布的“壬子学制”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一直实行和延续到1922年。从纵向来看,该学制规定大学年限为六七年,其中预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大学毕业后入大学院,肄业年限不定;从横向来看,与大学平行的学校,有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中等或甲种实业学校毕业生。如不升入大学,则可进入与大学平行的学校。

与以往颁布的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例如它规定废止尊孔读经,废止按学校、等级奖励毕业生科举出身资格的办法,将清末的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和堂长一律改称校长等。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逐步确立起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体制。根据清末学部与民初教育部的统计,这一时期的全国新式学校发展状况如表1-1所示。

表 1-1 全国新式学校发展状况

年份(年)	学校数(所)	学生数(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	37 888	1 024 988
光绪三十四年(1908)	47 795	1 300 739
宣统元年(1909)	59 177	1 639 641
民国元年(1912)	87 272	2 933 387
民国二年(1913)	108 448	3 643 206
民国三年(1914)	122 286	4 075 338
民国四年(1915)	129 739	4 294 251

资料来源: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230页。

从表1-1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全国新式学校数与学生数都有很大的增长,从1907年到1915年,不到10年的时间,学校数增加了91 851所,学生数增加了3 269 263人。而且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民